

## 第 一 章

### 误 入 歧 途

湘江水宽阔浩荡，碧波滚滚；浏阳河迂回曲折，清漪粼粼。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啊，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。然而，她也养大了一些像我这样的不肖子孙。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。她是圣洁的、慈祥的，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，喂养着自己的每一个儿女。

说来，读者也许不相信：少年时代的我，也曾像故乡水一样淳朴。

北伐战争时期，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、岳州等地，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。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，城内城外，欢呼声、鞭炮声震耳欲聋，举城民众夹道欢迎。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，跑前跑后，端茶递水，在剪着短发、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，寻找着自己的姐姐。他知道姐姐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，又进了武汉军分校，此时正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医生。

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，多么希望能像姐姐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啊！可惜他年岁太小，只会举着小旗

跟着大人呼口号，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，冲着父亲高喊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

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，为父亲靠房产、地租生活而羞耻。

“马日事变”前夕，他亲眼看见何键、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备司令危宿钟，从乡下窜回城来，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：“哼，老子又回来啦，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！”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不久之后就看见，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部、革命党人经过他家门口，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死。他曾偷偷地为他们哭泣，为他们不平。

1932年初，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，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，被开除出校门。社会的压力、父亲的咒骂，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。他不愿像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，毅然决定弃家出走，去上海投奔姐姐、姐夫，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、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。

那个少年就是我！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、单纯啊，慈母的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。

当时，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。我买了张统舱船票，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，就决然地离开了家门，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。

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，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乱。然而母亲的慈颜、父亲的威容，都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去了。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，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，踏上了人生的征途。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？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我相信姐夫，一想到有他在上海，心情就舒畅多了。

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。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，又去苏联留过学，而且北伐战争时，他任叶挺“铁团”的

团教导员……仅凭他的经历，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更何况姐姐曾来信说，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！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，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，难道还怕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？

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，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；岸边山上的红叶，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。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山水之间，忘却了离愁，忘却了烦忧。

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。江面渐渐开阔，波涛汹涌，浪花拍打着船舷，景色更加壮观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，从甲板登上顶舱，尽情地观赏浩瀚的长江，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。

“滚下去！country man！（乡巴佬）”一个声音呵斥道。

转身一看，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，双手叉腰站在我身后，仿佛我偷了他什么东西似的。我知道这头等舱住的大多是外国人，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？真想争辩两句。转念一想，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，但坐的是外国人的船啊，初次出门何必惹是生非？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，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。

“哐啷！”没走几步，一个东西从上面飞落到甲板上，我吓得本能地往后一跳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头盒。再一抬头，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，正在上面得意地哈哈大笑。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，见此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。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似的。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，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长江。说心里话，我真想连他们一起踢进江里。但理智告诉我，外国人是不好惹的，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！临时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说：“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，要好自为之。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去百日之忧……”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。我想，这

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，否则，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啊！

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。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，姐夫确实混得不错，漂亮的洋房，华丽的摆设，可比父亲的“沈家大屋”阔气多了。看到这些，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。我认为这才叫本事呢！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，而不是像父亲那样靠祖产、靠地租过寄生生活。

其实，我哪里知道，此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。“四·一二”之后，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，从革命队伍里一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。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，一个在幕前，一个在幕后；一个赤裸裸，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。这时的姐夫已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，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言听计从。

初到上海，姐姐、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找工作。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处闲逛。上海可真大，鳞次栉比的高楼、五颜六色的霓虹灯、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我想，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。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，上海租界林立，如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，外国人在这里同样是趾高气扬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听说不久前，外滩公园门口还有块“华人与狗，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，我越想越生气。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，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，侮辱我们呢？当时，我可真不明白。现在我才懂得，这些反常的现象，都是政治腐败、技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！

半个月后，我又一次催姐夫，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。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‘革命’，你懂得什么叫‘革命’吗？”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。我搔着后脑勺，憨笑地盯着姐夫说：“革命？！”

革命不就是像你们北伐那样吗？”

“对！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，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军阀，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。不过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任务。现在旧军阀打倒了，但革命尚未成功，社会上秩序很乱，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，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面。你还年轻，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，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。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，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，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，我这里正需要人呢！”

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。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，竟这么痛快答应留下我。我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，拉着姐夫的手喊道：“姐夫你真好！一言为定，你要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！”

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。他轻轻地把我按回沙发上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你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参加这个组织，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，对任何人，包括父母、妻儿、好友都不能泄露，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。另外，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，参加了这个组织，就不能任意退出；不能擅自结婚，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，批准才行。还有一条，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，没有胆量可不行！给你三天时间，好好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再找我，填份简历表，免得日后怨我这个做姐夫的没交代清楚。”

说实在的，当时我刚刚 18 岁，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，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，于是当即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。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的前身——蒋介石亲任社长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，一个被人们称为“魔窟”的团体，开始了我的特务生涯。

古人云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百年身。”今天，我

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！

当上联络员后，我化名陈沦，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、英租界、华界及沪西的四个情报组、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，取回情报。

有一天，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。我知道，“戴老板”就是特务处长戴笠。在当上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，经常听人说到他，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，我也不免有些紧张。

当时，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，戴笠兼任特派员，经常去那里办公。到了警官学校，我交出姐夫给我的信，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。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，这就是戴老板。我借着他打电话的机会，仔细地打量他。他中等身材，长方脸显得有些过长，嘴巴又宽又大，除了那双眼睛和又粗又黑的剑眉让人望而生畏之外，其它都很平常，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。

打完电话，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，并连忙必恭必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。他微笑着打量着我，边拆信边问：“你是新来的吧？”我机械地点了点头。他指了指沙发，示意我坐下，然后匆匆地看完信，就坐到我旁边，和蔼地询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。

看到他对待我那么和气、亲热，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给他。他边听边点头，鼓励我往下说。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！我小时候跟你一样，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。只要你在哪里好好干，就有前途！”他越说越上劲，索性站起来，双手叉腰说，“你知道，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，它进

可做革命的先锋，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，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。你好好干，就前途无量。你很幸运啊，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，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，才有今天的啊！”

他跟我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。临走时，他掏出 100 元钱，让我在杭州玩玩，并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，我儿子跟你同岁，在上海上大学，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。”

戴笠待我的态度，简直让我受宠若惊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好。回到上海，我把情况告诉姐夫，姐夫也很奇怪，他说：“戴老板这么喜欢你，这可真是难得啊！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！”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。现在我才懂得，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，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，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，思想很复杂，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，而我则是初出茅庐，年轻、单纯、可塑性大，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。

果然如姐夫所料，第二年，也就是 1933 年 5 月戴笠就提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。

情况是这样的：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，常常情报不实，戴笠便怀疑这个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又与该党发生了联系，命令姐夫派人把他押送南京。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。

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生，懂军事，会打枪，而我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，连枪也没摸过，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？姐夫灵机一动，出了个主意：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，说是我犯了“团体”纪律，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。当时徐昭俊很高兴，一路上总是盯着我，生怕我跑了。实际上，我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他的信，也在暗中盯着他。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，

戴笠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等候。

下车后，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，却没人理他，只是示意他上车。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：“他是送来的犯人！”我心里觉得好笑，可因为他还没上车，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，所以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，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。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，停了下来，来人从我手里接过信，就让我下车了，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进入监狱的。

徐昭俊一见我下车就有点急了，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：“他是犯人，他是犯人！怎么把他放了？”

车里的人冷笑道：“没错，没错，押来的是你！”说着还把头伸出车窗，笑着对我说，“没你的事啦，你回去吧！”

我高兴地点点头。

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，立即跑到鸡鹅巷 53 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处去看他，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和赏识。我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汇报。他高兴地夸我能干，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，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。

听到这个决定，我着实吓了一跳。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的，组员的成分很复杂，不仅年龄都比我大，而且阅历都比我深，有的是黄埔学生，有的出身土匪，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的小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？

我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？”

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，反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怕什么？他们又不吃人！多动动脑筋嘛！要想让组员信服你，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，对组员要奖惩分明，恩威并用，

特别不听话的，还有团体、纪律嘛！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，内心深处虽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，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任务，不免又有些苦恼，恐怕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于他。

情报组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，除了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，还要收集其它反蒋势力的情报，并了解地方军阀派往上海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，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和李济深、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、山西的阎锡山、四川的刘湘等方面的情报。这使我错误地理解，共产党和新、旧军阀，都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，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。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，现在居然在江西、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，这真是大逆不道。我竟把“马日事变”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

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，不辱没所谓“革命先锋”的称号，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。我一面向组里的组员请教，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。

不久，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，救火员可以爬房顶，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，而且还有所谓的“业余消防队”，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。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，自愿报名参加了“业余消防队”，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，不过不是为了去救火，而是“趁火打劫”，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到有用的情报。

可没过多少日子，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，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，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。

一天，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，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，一问才知道，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，被派到该社驻沪办事处工作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跟他拉上老乡，并对他说：“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？不要报酬，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。我有了新闻材料，一定发给你们通讯社。”对方听我这么一说，很痛快地就答应了。从此，我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，化名陈仓。有了记者这块招牌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，收集情报了。

渐渐地，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。我除了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，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，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。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我如此能钻营，对我的工作很赏识。我也为自己的“才干”而自豪，却毫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，使自己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。

## 第 二 章

## 十 里 洋 场

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、魔鬼的天堂。我虽到上海一年多了，但对上海社会的实质仍是知之甚少。当了情报组长后，办公室就设在法租界，那里烟馆、妓院、赌场比比皆是。在这段日子里我可真的大开了眼界，长了不少“见识”，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。

初到情报组，组员们大都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表面上敷衍我，背地里各行其事。只有一个叫黄漫芝的内勤人员待我还不错，闲来无事，他就把组里的情况告诉我，有时还带我出去玩。烟馆、妓院，我认为只有自暴自弃没出息的人才往那里跑，我是断然不肯去的，而赌场我倒很想去看看。

一天，黄漫芝领我去附近一家赌场闲逛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去买筹码，而是领着我一直往里走，不但没有人拦阻，反而有人迎上来笑着打招呼。

赌场门面虽不大，里面可不小，除了各种方式不同的赌博场地外，还有供赌徒们吃饭、休息的地方，不进赌场是很难看到这种场面的：赌台四周的人，大都像饿鹰似的，神色紧张地

盯着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，赢了钱的兴奋得两眼发亮，红光满面，热汗腾腾，还想着再赢再赢；输了钱的则急得眼睛发绿，面色晦暗，冷汗淋漓，恨不得嗓子眼里都要伸出手来，把输掉的钱捞回来；而围观者则无动于衷，就像是在欣赏一场猴戏。看了一会儿，我就拉着黄漫芝往外走，只见门房正往外推搡着一个没穿上衣的男子，说：“输了衣服算啥？回去拿了钱再赢回来嘛！站在这里有什么用？”

赢者贪婪的目光，输者绝望的神情，围观者冷漠的态度，都使我觉得不舒服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愿去赌场闲逛了。可是闲得没事时，总得找点什么消遣啊，于是我就寻找了一些自认为比较正当的娱乐，如打网球、游泳、骑马等。

想不到，上海的怪事真是太多了，只要走出家门，随时都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刚参加了骑射会不久，有天早上，天蒙蒙亮，我就去外面跑马。我正骑着马在一条新开的、尚未竣工的公路上奔驰时，突然发现半山坡上伸出半截棺材头，上面的木板还在活动。我向来不信鬼神，但看到棺材板在动，也不由得有些惊诧，就立即下马，握着手枪走过去，想看个明白。谁知，棺材头的木板推开后，从里面爬出个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外国小伙子，手里还端着一把咖啡壶。他见了我就用熟练的中国话说：“早上好！请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！”他的爽快和热情一下子吸引了我，我毫不犹豫地把手枪放下，坐下跟他聊了起来。

原来他是一个白俄青年，父母死后，无钱租住房子，发现这个地方很幽静，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出来，把里面打扫干净，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儿。白天，他有时出去打短工，有时穿着整齐，像个阔少爷，去偷、去骗，只要能搞到钱，什么都干。他还得意地告诉我说，住在这里既不怕人偷，又不怕人抢，比住在这高楼大厦里还“舒服”。他每天出去就把个骷髅头放在棺材边

上，一般人不会走近，就是小偷对此也不会感兴趣，所以他不用担心放在棺材里的咖啡壶和生活必需品丢掉。我想，如果利用他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我总是叫他“毛子”他也毫不在意。

不久，有几个新认识的青年约我去苏州、杭州游玩，我顺便邀了毛子一起去。他倒很爽快，说：“只要你管饭，去哪里都行。”同行的共五六个人，大都是西服革履，衣着整齐，只有我的这个白俄朋友，刚刚三四月份却只穿着衬衫和短裤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苏杭的美景真是名不虚传。那清雅多姿的苏州园林，那潇洒飘逸的杭州西子湖，确实妙不可言。遗憾的是，游览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大煞风景。

那天，当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苏州虎丘，登上一个约三四层楼高的山崖时，远处带状的小溪、依依的垂柳，近处盛开的鲜花、碧绿的草坪，尽收眼底。突然，同伴中一个大腹便便的阔少说：“这儿可真高！谁敢从这里跳下去，我送他 100 块钱。”

“说话算话？”毛子急不可待地问。他大概长这么大也没有过这么多钱。

“钱就在这里，你敢吗？”阔少得意地一拍衣兜。我尚未来得及制止，那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已经嗖的一声跳了下去。随着一声惨叫，他坠落崖下。我们忙探头张望，只见他正抱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在草坪上打滚。

我们跑下山崖，看见他的一条小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边，骨头都露了出来。他面无人色，满头大汗。我忙去扶他，他却伸出一只惨白而颤抖的手对阔少喊道：“钱！钱！拿钱来！”

这件事比赌场的情景更使我震动，前者拿运气做赌注，后者拿生命做赌注，这都是为了钱啊！钱竟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我

想，一年多以前，自己负气离家出走，若没有姐夫的帮助、戴笠的提拔，是不是也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地步呢？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。此时，我又想起了在浦东区看到的一件事情。

一次，情报组的一个组员得到情报，说在上海浦东区工人村，共产党正召开秘密会议，区长便决定行动组前去搜捕。我因初上任不久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，也就跟着一起去了。特务们赶到那里时，被一个在村口望风的年轻工人发现了。他知道特务也看见了他，转身就往村里跑，边跑还边喊了一声。一个特务一枪打在他腿上，他摔倒了，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。可是当特务们包围并冲进开会的地方时，与会者早都从敞开的窗口跑走了。这个会场就是这个年轻工人的家。他家的房子跟其他工人的一样，又矮又小，不同的是他是单身，室内除了一张破木板搭的单人床和床上那鱼网般的棉花套外，还有几把破木板凳，大概是借来的吧，墙角还有一个只剩几粒米的小陶罐。看样子他跟我年岁相当，但是比我显得粗壮。在往回押解的路上，我出于好奇，禁不住问他：“你看，你跟共产党闹了半天，结果还是穷成这样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他不屑地白了我一眼说：“跟你说，你也不懂，这是革命！”

“革命”？我不觉心头一震，心想，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是在干革命，这个同龄人也说他在干革命；我们的“革命”，有钱有官，冠冕堂皇；而他的革命，缺吃少穿，杀头坐监。相形之下，我觉得还是我们的“革命”合算。

想起这件事，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。我不愿像赌徒那样靠运气发财，更不愿像毛子那样用命去换钱，当然也不愿像浦东那位同龄人一样贫困潦倒，家无隔夜粮。想到这些，我更加欣赏、珍爱自己已获得的地位。但我也清楚地知道，要想维护自己现有的地位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一年多来，我看见不

少同事因工作疏忽而受处分，我的前任情报组长仅仅因为戴笠怀疑他有“通共嫌疑”就被关押。一个人要怎样去做才能巩固、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，平步青云呢？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。

自从毛子跳崖之事发生后，我再也不愿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出去游玩了。我自己买了支猎枪，到哪里去玩都把猎枪一背，边打猎边游览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这天，我因公去浙江，顺便到普陀山游玩。当时正值香火旺季，善男信女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寺中烧香、还愿，听法师讲经。山上苍松翠柏，林中庙宇飞檐，念经声阵阵，木鱼声梆梆，人人的表情都是那样虔诚、肃穆。这是一个多么圣洁、幽静的地方啊！我信步来到庙中，想看看香客们如何磕头作揖、顶礼膜拜。

路过讲经殿时，看见一群佛门信徒正虔诚地坐在蒲团上聆听法师讲经。这位法师年纪并不大，约 40 来岁，身着袈裟，光头危坐，犹如一尊佛像，显得神圣、庄重。真怪，这法师怎么这么面熟？在哪里见过？一时想不起来，于是我也加入信徒们的行列，坐下来听他讲经。他讲得头头是道，声音悠长悦耳，真像是从上传下来似的。讲罢他说：“各位居士明天请早。”信徒们便纷纷离去。我仍坐在那里不走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忙走过来，笑眯眯地冲我一合掌说：“阿弥陀佛！朋友，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”这下我才想起来，他曾跟我做过邻居。

我当情报组长之后，曾住在英租界静安别墅一个白俄老太太开的公寓里。这所公寓环境很幽静，里面住的都是单身的男子汉。胖胖的白俄老太太做得一手很好的俄国菜，她不仅出租房子，而且包饭。在这个公寓里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中年人，他衣着整齐，风度翩翩，戴一副玳瑁眼镜，很像个学者。他

和气而又寡言，从不与邻居们来往，有时在餐厅、楼道碰见了，他也只和善地笑着点点头，很少说话，连房东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我出于好奇曾偷偷地跟踪过他，发现他在上海除了吃喝玩乐、和漂亮女人跳舞外，从不干正经事。我想他大概是海外某阔老的公子吧，否则谁又能像他那样逍遥自在呢？

我望着面前这位身披袈裟已摘掉了眼镜的邻居，实在迷惑不解。他什么时候出家了呢？他从我眼神中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就拍拍我的肩说：“老弟奇怪吧 来 到屋里坐坐 我慢慢告诉你。”

他的卧室与其他出家人一样简单、朴素。他从床铺底下拿出几听贴着素菜商标的罐头和一瓶上好的白酒请我。我不喝酒，只夹了几筷子罐头菜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些素罐头里面大都是荤菜。他一边吃喝，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。

他父母早亡，是在南洋经商的叔叔供他上了大学。他原以为发奋读书就能有所作为，所以读书很刻苦，是上海工科大学的高才生。毕业后，他因国内没有靠山，始终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，便想去南洋找叔叔，可是年迈的祖母无人照顾，他苦闷极了。闲居在家时，看见祖母整天烧香念经，出于一时的好奇，他顺手翻看了一下祖母的佛经，并问祖母是否明白这其中的意思。祖母告诉他说，很多都看不明白，但寺里有时会花钱请来高明的经师给讲解，所以多少懂得一些。祖母的话给了他很大启发，他便开始潜心研究佛经。凭着他的聪明和才识，他很快就当上了经师，每年香火旺季，他就到各名山古寺去讲经。

他讲着讲着渐渐激动起来，也许多喝了两杯酒的缘故吧，他的话语变得异常激奋。他说：“在如今的世道上，知识才学有什么用？社会不需要你。老老实实地做人，就无立足之地。我要生活、要吃饭，我不能靠叔叔一辈子。我自己没有后台，没有钱财，要想自立就得弄虚作假，或者是投人所好，或者去制伏

别人。不过，我没本事制伏别人，只好放弃我的学业，投人所好。现在我讲经，信徒们爱听，各得其所。我每年讲三个月的经，就能挣够我一年的花销。其余九个月，我就往上海一住，袈裟一脱，西服一穿，凡人一个！”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，对我一举杯，说，“喝！今朝有酒今朝醉！”然后一仰脖，把酒一下全倒进嘴里。

告辞后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躺在床上辗转不宁，无法入睡。赌徒的眼睛、毛子的断腿、浦东工人的破被、邻居的袈裟，都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。赌徒的道路太悬，毛子的道路太蠢，浦东工人的道路太险，那么邻居的道路呢？我说不出来。可我觉得他所说的投人所好和制伏别人的手段，倒是可以兼而用之的，我自信有这个能力。从此，我决心把这两种手段运用到工作中去，因为我不愿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无立足之地。